



龍應台為創作《大江，大海，一九四九》而張開的歷史巨網，的確網羅了很多不同社會階層和背境的人。這些人在 1949 年之後的半個世紀裡，多數生活在中、台、港三地，際遇和發展各不相同，而且多數互不相干。就像從一個花洒噴出來的水花，各以不同角度和速度散落在大塊玻璃地板上，其水珠與水漬便拼砌成一幅繽紛有緻的圖案。

巨網上首先網羅著的是龍應台的一家。1949 年一月，二十四歲的龍太太美君帶著兩個嬰兒從淳安城到廣州尋夫不遇，再轉到海南島時已是 1950 年五月，在此她和丈夫失散，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，帶著兩幼兒登船直航台灣高雄。上岸後失去軍眷身份的美君知道一切要靠自己了，她用貼身藏著的五兩黃金頂下離碼頭不遠的一個菜攤做瓜果小買賣，這方法『一方面可以掙錢，一方面可以尋人——丈夫如果還活著，大概遲早會在碼頭上出現。』（P.28）聰明決斷的美君果然藉此方法和丈夫龍槐生（當時軍職是憲兵連長）重逢。一家人，除了在湖南留下給美君母親照顧的大兒子外，倒能整整齊齊地在台灣安穩地過了四、五十年的太平日子。在大流離的苦難圖中，龍家無疑是很幸運的吧。

和美君同時期從中國大陸倉惶逃到台灣的有數十萬軍隊和部份軍眷。多數士兵都在不知前途的情況下奉命登船，隻身抵台，從此和留在大陸的家人斷絕音訊四十年，甚至永不重敘，譜出無數的血淚史。這其中包括《江海四九》所描述的台灣詩人痲弦、導演張曾澤、文學家管管和書中沒有提及的台灣高僧聖嚴與星雲等等。

除台灣外，香港是 1949 年中國逃亡潮的最大收容地，在兩三年間便有接近一百萬中國人棲身於這一塊被稱為「彈丸之地」的英國殖民地。在中共「保留現狀」的政策下，香港人得以在改朝換代的歷史空隙間，享受了四十八年（1949——1997）「自由但不民主」的太平歲月，並創造出了亞洲以至全球的經濟奇蹟。

龍應台的歷史巨網當然網羅了很多在 1949 年逃港的人物。在描述這些香港人之前，她根據在香港生活和教學多年的體驗，寫出港人的特徵：『香港人不太談自己的來歷。……可能彼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寧波人，而且都是 1949 年前後抱在媽媽懷裡過了羅湖口岸的。

他們工作的壓力太大，工作的時間太長，現實的滾動速度太快，每個人都在當下的軌道上專心一意地拼搏向前。經濟的成就、專業的高標準、現代化的領先，是靠一種力爭上游的拼搏意志得到的。粵文化生命強韌……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同化力，1949 年流過來的百萬人潮，一過口岸就進入這個文化和語言的大吸器、大熔爐裡，……六十年後你完全看不出他們是 1949 年的遷徙者。於是，從外面看起來，就是一個整體，都是說廣州話的香港人。』（P.131）

龍應台對香港人的觀察敏銳，綜合力也很強，所說的都很對。唯一可補充的是：香港人沒有「反攻大陸」的政治包袱。所以，從 1949 年至 1982 年中英談判香港回歸之前，都可全力發展經濟，少談政治，和台灣的政治經濟模式大不相同。

1949 年逃到香港的過百萬人中，龍應台首先描述於 1950 年六月被香港政府移送到調景嶺的七千多個難民。『這是一個沒有電的荒山，一切從頭開始，港府已經在山坡上築構了上千個 A 字形油紙棚，每棚住四人，另有三十個大散棚，每棚容納七十人，社會局供給每天每人白米 18oz、內和肉 2oz、青菜 8oz，腐乳或鹹魚 2oz』每天派飯兩次，難民要排隊領取。難民當中有很多國民

黨的軍人，其中一個在幾十年後接受龍應台的訪問時，還憤慨地說：『幾十年來，我一幕幕地回想，真是作夢也想不到我會落敗到這種程度……爲什麼會跑到來香港呢？原因是軍心變了！』調景嶺這個特殊的「反共區」，一直維持到 1997 年香港回歸後才完全結束。現在調景嶺已是一個高層公屋林立的新社區，和香港其他新社區並無分別。在此處 1949 年的烙印已不可復見。其實調景嶺只容納了七千至一萬餘中國難民，香港市區在 1949 年以後的幾年，每年仍湧進二十萬中國難民，他們沒有接受香港社會局的救濟，他們奮力打拼，很多位在三四十年後已成爲香港或台灣的知名人士，龍應

台在書中所網羅的包括：

香港、中大、新亞學院創校人錢穆。

香港蔣震集團創辦人蔣震。

香港港大校長徐立之。

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終身成就得主余英時。

台灣廣達集團（全球最大筆記型電腦公司）總裁林百里。

台灣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。

台灣文學家白先勇。

台灣詩人及畫家席慕容。

這一群是在中國現代大流亡圖中，受苦難較少的人，而且最後也獲得受人敬佩

的成就，和很多逃難到台灣或沒有離開中國大陸的更多同胞相比，他們算是幸運得多了。相信龍應台在寫這一章時，所承受的「哀傷和荒涼、慟的生離死別，和重重的不公不義」，是最輕暢的吧。

